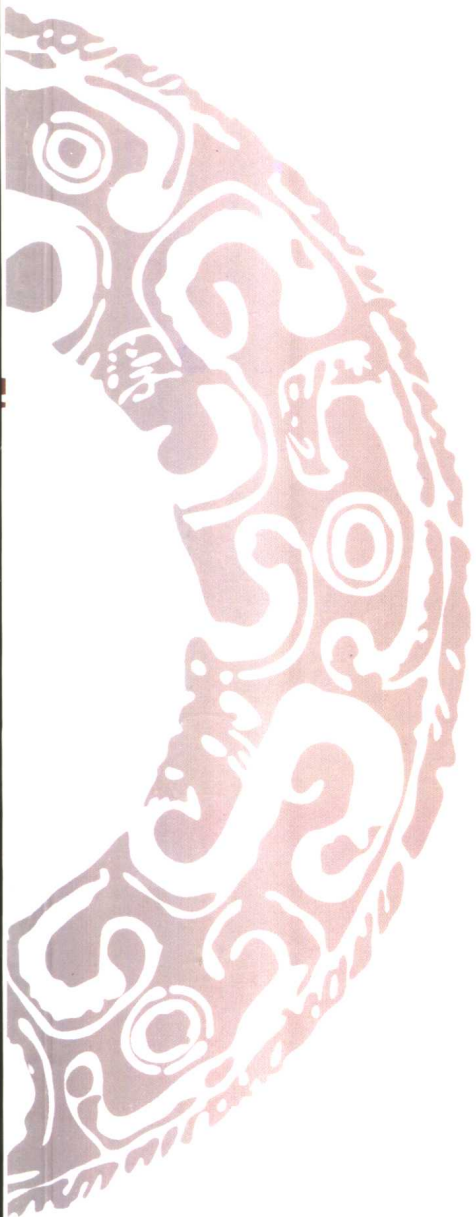


何炳松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浙东学派溯源



浙东学派溯源

何炳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学派溯源/何炳松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何炳松作品系列)

ISBN 7-5633-5075-6

I. 浙… II. 何… III. 儒家—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25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9mm × 1 194mm 1/24

印张:4 字数:48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6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当民国十七年的冬天，著者曾承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的邀请对于中国史学的演化作下述的讲演：

吾国史学之发展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孔子作《春秋》以迄荀悦述《汉纪》，前后凡七百余年，实为吾国史学上两种主要体裁——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之时代。荀悦而后以迄于北宋末年，其间约千年，吾国史家除继续发挥编年与纪传二体外，颇能致力于通史之编纂。然所谓通史乃《史记》式之通史，非吾人今日之通史也，故此期可称为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之世实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大宗门之思想至是皆始成系统，而儒家一派独演化而成所谓浙东之史学以迄于现代。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兹请略述三期史学演化之经过。

吾国纯粹史籍之留存至今者当以孔子所作之《春秋》为最古。以事系日，以日系时，实为中西史籍最初之雏形，而编年一体遂成吾国史籍中开山之形式。孔子之后再过五百年而有司马迁之《史记》。《史记》一书仿《春秋》而为本纪，仿《左传》而为列传，此外别创八书以记载天文、地理及其他各种制度。其义例之精与取材之

当,实为古今中外史籍之冠。自司马迁创纪传体之历史而后,不特吾国之所谓正史永奉此体为正宗,即吾国其他各种史裁如方志、传记、史表等,亦莫不脱胎于《史记》。司马迁之得以千古不朽,诚非无因。此后班固仿纪传体而作《汉书》,荀悦仿《春秋左传》而作《汉纪》,虽对于司马迁与孔子所创之纪传编年两体略有变通,为世人所称道;然就大体而论,究觉因袭之处多而创作之处少。其他作者类皆陈陈相因,别无新见。唯编年与纪传之二体则已日臻成熟之境矣。此为吾国史学演化经过之第一期。

自荀悦而后以迄北宋之世,吾国史家一面继续发挥编年与纪传二体,一面颇能努力于通史之编纂。言其著者则有梁武帝之《通史》,司马光之《通鉴》,郑樵之《通志》,以及袁枢之《纪事本末》。凡此诸作之宗旨莫不在于贯通古今。然吾人试一考其内容,则《通史》与《通志》之作意在推翻班固之断代而恢复《史记》之规模,司马光之意则大体仿自荀悦,实欲融会纪传体而反诸编年以规复左氏《春秋》之旧。故今存之《通鉴》与《通志》虽不失为吾国史学上之名著,然大体仍未能脱《春秋》与《史记》之成规,与现代西洋学者所主张之综合史相去仍甚远也。唯此期中有刘知几之《史通》,及袁枢之《纪事本末》两书,前者对于吾国自古以来之编年与纪传两体下一详尽周密之批评,隐为吾国旧式之史学树一完美圭臬;后者依据《通鉴》,别辑成书,因事命篇,首尾完具,其所得结果无意中与现代新史学上所谓主题研究法者不约而同,实为吾国史籍中最得通意之著作。然就大体言,此第二期史学之演化,仍属旧式通史之发挥,初无新法之创见也。

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经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王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

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故吾国学术至南宋而后成为三大宗,吾国史学亦至南宋而后始独树一帜,南宋之世实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也。

吾国南宋以前之史家虽亦不一而足,然史学之发展不成系统,具如上述;而且经史文三种学术往往混而不分。或轻史重文,成喧宾夺主之势;或以经驾史,抱褒贬垂训之观。故学者之于史学或视同经学之附庸,或作为文学之别子。史学本身几无独立之地位焉。自南宋以后,浙东史学大兴,当时道学家至诟浙学为知有史迁而不知有孔子,其盛极一时之情形,即此可见。

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俭传入宁波而有王应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金华本支则曾因由史入文,现中衰之象;至明初宋濂、王祿、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唯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入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

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史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

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

唯浙东史学第一期之初盛也,其途径乃由经而史,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第二期演化之经过亦复如是。今人之以文学眼光估计全氏之《宋元学案》及章氏之《文史通义》者,不一其人,即其明证。此殆因吾国史籍过于繁重,科学方法又未盛行,遂致研究历史者或陈陈相因不能有所发明,或避重就轻退而专意于文学。浙东史学之盛极难继,盖非偶然矣。

著者在这个演讲中发表几个大胆的主张:第一,就是认定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第二,就是认定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

上面这两个大胆的主张,好像向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我国学者好像到如今还是认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只有两大派:就是程朱一派的道学,和陆王一派的心学。他们好像认道学为儒家学说的冠冕,把道学去包括儒学;至于真正纯粹的儒家反被他们降到第二流的地位,在正史上只占了区区的儒林一门,几乎和寻常的文学家没有分别。至于程朱两人的学说,他们更认为完全是一脉相传;即使朱氏的学说果然和程氏不同,他们亦认为这是朱氏的青出于蓝,并不是根本上两人异派。

其次,我国学者好像到如今还没有认识南宋以来我国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或“金华学派”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从前人几乎把它看做邪说,现代人虽然能够赏识它,把它的地位提得很高,认为我国学术史上最最有光彩的一派,但是他们好像始终把它认做突起的苍头,好像佛经

中所谓昙花一样，来无踪，去无迹，一现之后，便长逝了。

著者研究之后，却独持异议，发表他那大胆的主张。他竟大胆地把南宋以来我国学术思想只有程朱和陆王两派的说法完全推翻，主张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旧，演成程朱王的三大派。并且因此竟大胆地把程朱两人同属一派的说法根本打倒，把两人的思想加以分析，表明他们的思想根本不同。著者又大胆地认程氏的学说为南宋以来儒家思想的正宗，并且认浙东的学派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而程氏实为浙东学派的宗主。

以上种种主张都是著者在民国十七年冬日研究宋元学术思想后所得到的愚见。这种愚见是否正确无误，著者自己不知道。因为著者后来曾经发表过一篇讨论程朱同异的文字，经过多年还不曾得到国内同志的指教。换句话说，著者大胆的主张到如今还没有人发生过异议。因此著者不但敢发表他的主张，而且近年来研究明末刘宗周的学说以后，似乎觉得自己的主张很富有成立的可能性。

著者所以要研究这一段中国学术史，本有他的动机。当民国十七年时，他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当时他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著者当时看见浙东诸家学说的粹然一出于正，但是竟不能幸免朱熹的痛骂，他就大为惊异了。后来他又看见浙东诸家的学说几乎全是由程氏方面传来，他更是惊异了。因此他的研究兴趣骤然提高许多，而且更进一步去研究程朱两人学说的同异。结果就做成前面所说的那篇辨异的文字，同时并在中国公学发表了前面所述的那篇讲演。

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见了一件程

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见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见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见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道释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著者现在把他那溯源所得的种种史实,用笔详述下来,贡献给国内研究学术史的人做一种可能的参考和讨论的根据。

当著者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曾经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提出来和胡适之、胡朴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纬平、姚名达几位先生再三讨论过,承他们指正了诸多错误,著者非常感激他们。周予同和姚名达两位先生很热心地供给他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旁证,尤其有功于这本小书的完成。不过著者近年来职务很忙,读书的工夫实在不多。他在本书中所发见的种种史实,虽然不免涓涓自喜,认为一得之愚,大胆出版;但是究竟这是一得还是一失,他自己实在不敢放心,始终希望国内学者能够给他一个批评的判断。

著者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浙东学派和程朱分家的关系	1
第二节 北宋以前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	3
第三节 南宋以后的学派和程朱分家的关系	10
第四节 过去的程朱分家论	12
第二章 程朱两人的根本思想	17
第一节 一元论和二元论	17
第二节 几个重要的名词	38
第三章 理学上几个重要的问题	48
第一节 性气的问题	48
第二节 已发未发的问题	54
第三节 知行的问题	61
第四节 义利公私善恶经权的分别	67
第五节 生死鬼神命数等问题	76
第四章 方法论	88
第一节 主敬集义是一是二的问题	88

第二节	格物或养心的问题	98
第三节	格物的方法问题	105
第五章	圣经和唐鉴	115
第一节	易经的理数问题	115
第二节	春秋诗礼的问题	125
第三节	唐鉴的问题	132
第六章	浙东学派的兴起	134
第一节	程朱学说的总结	134
第二节	朱氏属于道家的证明	136
第三节	南宋以后的三家	142
第四节	程氏学说的入浙	14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浙东学派和程朱分家的关系

学术思想史的重要 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史,应该先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演化的经过。因为学术思想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以学术思想的研究,在史学上,实在是一种画龙点睛的工作,非常重要。英国大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说过:

现在虽然有人研究各种自然现象、政治和宗教,但是总没有人能够专心去描述自古以来一般学术的状况。世界史上没有这一种东西,就同没有眼睛的‘独目怪’(Poly Phemus)一样。因此,那最足以表现人类精神和生活的那一部分就缺少了。我知道现在各种科学,如法律、算学、修词学、哲学等,常常提到学派、著作家和各种著作物,而且亦提到美术的发明和各种习惯的关系。但是一种平允的学术思想史,包括思想和思想派别的古风 and 起源,他们的发明、习惯、发展、反抗、衰替、消沉、埋没、移转,他们的起因和理由,和所有自古以来关于学术的一切事实,我可以说到如今还是没有。(何译《新史学思想史的回顾》)

培根的意思就是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为文化史研究上一种必不可少的

东西,而且研究学术思想时,应注意他们的沿革。这个主张凡是研究历史的人当然都承认是不错的。著者所以要追溯浙东学派的起源,本意亦就在此。

浙东学派的溯源 “浙东学派”在我国近代史上实在是很有光彩的一个学派。因为这一派学者大都是史学家,讲究经济,最切实用,和道佛两家的玄谈大不相同,实在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但是这一派学说的渊源从何而来,中坚人物是那几个,风声所树在什么地方,好像到如今还没有人去详细研究过。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个缺憾。

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目的只在追溯浙东学派的起源,所以只叙述到浙东学说成立时为止。对于浙东学派怎样流传下去的情形,暂不去叙述它,因为这是应该归入浙东史学史的范围。因为这本书既然重在溯源,所以我们不能不由浙东诸家追溯到程颐,不能不追溯程颐和朱熹两人学说的师承和同异,不能不追溯南宋以来我国一般学术思想的流别,不能不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学术思想的起源和流别。

溯源上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溯源的研究中,要以南宋以来的流别,和浙东学派源自程颐两个问题为最重要而且困难。因为这两个问题好像向从来没有加以注意和解决过。但是这两个问题能否解决,要以程朱学说是否不属一家的主张能否成立为前提。因此著者在这本书中就不能不把这一个前提加以详尽的叙述和充分的说明。我们必先能证实程朱是两家,才能证实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确是依旧三家。亦必如此,才能证实程颐这个人确是浙东学派的开山,而且并可因此了解朱熹一派何以要尽力排斥浙东的学说。

本书的内容 著者研究这个问题时,他的步骤虽然是由今溯古;但是叙述时却不能不由古及今。所以本书的内容先述我国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学术思想的起源和流别,继述程朱两人思想的异同,再述南宋以后儒道佛三家学术思想的转变,最后乃述程颐学说的入浙和浙东学派的

突起。

第二节 北宋以前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

中国学术史上的三大家 我们在讨论浙东学派的起源问题以前,不能不先讨论程朱分家的问题,更不能不先把北宋以前我国学术思想演化的情形大略首先叙述一下。南宋的陆九渊曾经说过:

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象山全集》卷二《与二顺伯》)

陆氏此地一口认定中国的学术不出儒道佛三家,这是很合事实的一句话。我们就历史上看来,儒道佛三家鼎峙的局面不但在北宋以前是如此,就在南宋以后亦是如此;不但在中国的思想上是如此,就在文化上亦是如此。总而言之:儒道佛三家既是中国学术思想上三个最大的潮流,亦是中国文化上三个主要的元素。

中国学术史上两大时期 著者的愚见以为我国的学术思想虽然经过许多变化,但是就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两个大时期,而以北宋末年为枢纽。第一期从上古到北宋末叶为中国三大思潮起源和扩充的时代,情形比较的混乱而且不成统系。第二期从南宋到现在为中国三大思潮经过北宋末年一番融化之后进于成熟的时代,从此流别统系都是非常地分明,《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一类著作有出版的可能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据。不过我国的学术思想在西洋科学没有输入以前无论怎样变法总跳不出儒道佛三家的窠臼。

三家思想的起源 我国学术思想的起源要以儒家为最古,春秋末年

的孔子就是这一派的开国元勋。后来经过战国时代孟子荀子诸人的发挥乃演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学派,这就是所谓儒家。至于道家思想的起源比较的复杂多了。大概地说,原始的道家思想比较的高深,相传发轫于和孔子同时的老子。但是后世所谓道家除仍旧崇奉老子庄子一班人做他们的祖师以外,并亦参有许多我国原始的迷信如白日飞升和阴阳五行等等无根的玄理。这一派道家是战国末年一班燕齐方士所创造出来的道家,他们的理论可以说是集原始道家和阴阳家的大成,在我国的士人阶级中很占势力。此外还有东汉以来的道教,它是由道家玄理中演化出来的一种具有宗教形式的迷信,在我国的下级社会中具有极浓厚的势力。不过所谓道家虽然有原始的道家、方士所创的道家和道教的道士三种不同团体,但是他们的基本信条却是大同而小异。这就是一方面把老庄的无为主义附会成功一种养心和修炼的功夫,一方面又把阴阳五行的玄谈发挥成功一种贯通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哲理。至于本文中所谓道家大致是指方士所创的那一派,不是指原始的道家或者道教中的道士。至于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的佛教虽然起源亦是很早,差不多和孔子同时,但是我国的佛教却是直到东汉初年方才传入国中。此后逐渐发展,不但成为我国社会上一个主要的宗教,而且成为我国学术思想上一个主要的学派。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的一般文化上就成一个三家鼎峙的局面,这个局面直到现代西洋科学输入之后方才露出破绽,根本动摇。

三家思想的演化和相互关系 自从儒道佛三家在我国的文化上形成鼎足三分的局面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史就产出许多五光十色或者亦可以说是乌烟瘴气的陈迹。但是在这种杂乱无章的事迹中我们可以寻出两条线索来:一是三家本身的发展和内讧,一是三家相互间的化合和排挤。这种化合和排挤一直到了北宋末年方才告了一个相当的总结束。从此以后,儒士道士同和尚虽然仍旧各能维持他们自己在我国文化上的

地位和势力,但是有一部分的道士同和尚已经是脱去了道佛的外褂,穿上了儒家的衣服。这两派就是著者所说的“儒化”的道家和“儒化”的佛家。纯粹的道士同和尚本来泾渭分明,用不着我们再去讨论,我们应该注意辨别的就是南宋以后那班貌似儒家的道士同和尚怎样的混入儒家门户做出喧宾夺主的把戏。我们现在先来叙述北宋以前三家发展和化合的情形。

儒家思想的演化 儒家的学说重在纲常,很有利于我国古代帝王专制的社会。所以经过西汉初年六十年间朝廷竭力提倡之后,到了汉武帝时儒家就定于一尊,变成一种国教相似的东西。自从西汉末年以后,儒家自身对于经书忽然发生一种所谓今古文的争执。双方家法森严,辩论热烈,直到东汉末年才有人把它们糅合起来。两家同异的问题虽然始终不曾解决,但是两家的争斗却从此渐告平息了。南宋诸贤的讲学所以能够不再蹈汉人的覆辙,和“宋学”所以和“汉学”不同,原因就都在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空前的进步。

道家思想的演化 至于原始道家的思想本以反儒为主,所以重在无为而治返诸自然。这种高深的思想大概亦起源于春秋末年,老子和庄子就是传说中的创始者。到了战国末年燕齐各地忽然出了一大批的方士,他们一方面拉拢老庄这班人来做他们的领袖,一方面又采取我国原始的迷信大唱神仙和阴阳五行等等浅陋的哲学。因此秦汉以后的道家和战国以前的原始道家面目已经完全不同了,很有点集我国儒家以外所有一切玄谈和迷信之大成的神气。司马谈在西汉初年时说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自序》),恐怕并不是夸大的话。后来又经汉武帝的提倡,势力更加扩大,就此和儒家成一种平分天下的局面。到了东汉初年张道陵出来把道家的玄谈差不多完全“迷信化”了,甚至老子的面上亦把他蒙上一层很厚的迷信之幕叫他为太上老君;同时亦把一部分的道家变成一种宗教的信徒去迎合我国下级社会的

心理。这就是我国道教的起源。从此我国的历史上新添了一个“国产”的宗教流行于下级社会中。

佛家思想的演化 至于佛教原来创始于印度。我国人虽然自从汉武帝通西域以来就已经知道它,但是直到东汉末年才开始努力于佛经的介绍。后来因为我国当时既然有两晋以来那种崇尚虚无的风气,又经过五胡乱华时代的干戈扰攘,人心厌乱,所以佛教中那种色即是空、大慈大悲的说法很合当时人的心理。佛教的势力因此逐渐发展,经过南北朝而到了唐代,竟达到极盛的地位。不但教义到此大明,就是宗派亦到此大备了。从此我国文化上除儒道两家以外并再加上一个佛家,成一个三分天下的新局面。以上所述的就是三家本身在北宋以前发展的情形。

三家思想的化合和排挤 至于在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间互相化合和排挤的情形,我们可以引日本境野哲所说的几句极其精警极其简括的话来说明它:

道教与佛教类似之处颇多,故其间争论亦烈;同时亦有相近之倾向。儒家与佛教之性质相去较远;儒为世间法可称政治学,佛为出世间法属于宗教;范围不同,故其争较少。(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三第十六章)

他这几句话实在是和事实相符,我们现在应该把三家学说不同的地方和三家互相化合排挤的情形大略叙述一下来证明境野哲所说的话实在不错。

三家学说的同异 我们为便利读者起见,在此地先把三家学说同异的地方悬空的大概的说明一下。我们倘使借用“尊德性”和“道问学”两句话来代表三家学说的概要,那末著者的愚见以为儒家所注重的在道问学;佛家所注重的在尊德性;而道家则自命为两方面都能兼顾的人,不